



乡村学校的教室

“

这些乡村学校最好的学生,往往只能考上省会的大学。校长们感慨“好像怎么做都赶不上外边”。

人民大会堂里,一位老师紧张得手脚不知道放哪里,另一位校长发言的声音都在发抖。

他们羡慕北京的孩子又白又胖,也羡慕这里的学生不是留守儿童,能开家长会。

”

A

“好像我们怎么做,都赶不上外边这么好”

在他的学校里,几乎所有学生都吃不上早餐。事实上,孩子们的正餐也常常只有蒸玉米饭。

在到达北京的当天,卢有英就发现,这是个和自己家乡截然不同的地方。“北京太牛了,太美了!”在打给自己学生的电话中,他只能不断重复这个简短的句子。

过去的几十年,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山深处的那所学校里度过。校园里最高的建筑物是别人捐赠的两层小楼,楼上的学生一跺脚,楼板就嘎吱嘎吱地响。

而现在,宽敞的街道、披着玻璃幕墙的现代化高楼,几乎每个场景都让他感到吃惊。

让他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活动主办方安排的一顿自助火锅午餐。整顿饭的过程中,环形运输带上不断回转的肉片、蔬菜让他目不暇接,他费了好大劲儿,也没能记住各种复杂的、从没吃过的菜品名称。

“好像我们怎么做,都赶不上外边这么好了。”他不断感慨。在他的学校里,几乎所有学生都吃不上早餐。事实上,孩子们的正餐也常常只有蒸玉米饭,只有家境好的学生,才舍得花5毛钱,给自己配上一包榨菜。

B

“最成器”的学生也只考上省会的大学

学校用红漆在教学楼外墙上刷着“知识改变命运,文化改变人生”,可他最喜欢的一名学生,最后也只考上了桂林的一所大学。

来自贵州赫章的校长郭昌举叹着气感慨:“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,县城离北京又差了50年。”

这些校长大多数都没来过北京,很多人几乎从没离开过自己居住的县城。即使是他们的学生,也很少有人有机会来到这里。过去几十年,这50多位乡村校长所带过的学生,只有一个人考进了清华大学,很多“最成器”的学生,通常也仅仅能够考上省会里的大学。

至于卢有英,他的学校用红漆在教学楼外墙上刷着“知识改变命运,文化改变人生”,可他最喜欢的一名学生,最后也只考上了桂林的一所大学。

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参观北大、清华校园的时候,这些校长会显得那么兴致勃勃。一位校长在车上开玩笑说,自己“要帮学生们沾沾仙气”;而卢有英也赶紧掏出了自己的相机,因为大山里的好多孩子都让他“多拍些清华、北大的相片带回去”。

## 乡村校长谈城乡教育鸿沟 村离县城差20年 县城离北京差50年

许多校长坦承:已经不堪重负

得知自己有机会到北京参加活动的时候,广西大化县江南乡尝梅小学的乡村教师卢有英激动得“话都讲不出来”。他做的第一件事,是跑到县城买了两套新衣服、一双凉鞋和一个斜挎包,换下身上“二三十块的破衣服”。

“村里人都说,穿我以前的衣服到北京肯定丢脸,北京人不像我们那样随便。”他腼腆地笑着说。

卢有英参加的是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。在北京的一周时间里,他和54位来自贵州、云南、四川等地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小学校长一起,接受了有关学校管理的培训,游览了故宫,还参观了北大、清华。甚至,他们还有机会坐进人民大会堂,在会议室的主席台上讲讲话。

“我们希望让这些来自基层的乡村老师到人民大会堂,做一次真正的主角,告诉社会各界,大家该做些什么去缩短城乡教育的差距。”来自项目主办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官员李昊说,这是国内首次举办以乡村校长为主角的论坛。

不过,对于卢有英而言,一个更加直接的收获是:这一趟行程中,44岁的他第一次有机会坐上火车,也第一次有机会来到比省会南宁更加遥远的地方。

C

小学三年级时孩子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

这位校长在北京之行里吃惊地发现,这里的学生们都“又白又胖”,而相比之下,自己那些山里的学生,都显得那么瘦、那么矮小。

除了四处参观,他们最重要的行程,是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“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”。不过,8月24日这一天,当卢有英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的会场时,他紧张得头脑空白,几乎“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”。

和他坐在一起的有北京高校的教育专家、媒体负责人,以及大型企业的高管。可在此之前,他不知道什么叫“论坛”,也没见过这么大的会场。他对于开会唯一的印象,就是“关掉手机,不要讲话”。

事实上,几乎每个参会的校长都露出了点紧张的神色。四川省普格县校长刘日沙站上讲台后,双手一会儿背着,一会儿插袋。

“我第一次来到北京,站到人民大会堂之中,确实……”这位老校长顿了一下,“该怎么说呢?我比较激动,还有些……有些害怕。”

另一位贵州赫章山区小学校长聂章林在台上一股脑背出了许多数据:孩子的每一顿饭要花多少钱,孩子上学时到底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。

“我仔细算过,小学三年级毕业时,孩子就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了,累都累得长不大!”聂章林加重了语气,声音却有些颤抖。

这位校长在北京之行里吃惊地发现,这里的学生们都“又白又胖”,而相比之下,自己那些山里的学生,都显得那么瘦、那么矮小。

D

“如果能请到家长,我们的教育就不一样了”

在卢有英的学校里,90%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,“家长们连人都找不到”。

在北京的几天里,卢有英满脑子都在考虑,新学期即将开始,学校多了一个班级的新同学,却怎么也腾不出一间新教室。

连坐在人民大会堂宽敞的会场的时候,这个乡村教师依旧在默默盘算:“实在不行,只能让两个班级90多个孩子挤在一个教室了。”

在论坛举办前的两天,这群乡村校长曾经与北京崇文小学校长进行了一次交流。

来自北京的校长给大家展示了崇文小学的环境,家长们对学校的赞美,以及该校如何“用心、用情、用爱”做好学校的管理。

卢有英认同这所小学的管理理念,但一些具体的方法他却没法照搬。比方说,这所北京小学常常召开家长会,家长与老师可以沟通许多问题。但在卢有英的学校里,90%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,“家长们连人都找不到”。

“如果我们也能请到家长,我们的教育可能就不一样了。”卢有英说。

E

私底下许多校长坦承“自己已经不堪重负”

在这些学校里,师生比例普遍达到1:30以上,老师和校长统统身兼多职。他们教书,做饭,当宿舍保安,也当孩子们的“爸爸妈妈”。

在卢有英生活的瑶族村子里,年轻人越来越少,当年男女青年对唱山歌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。乡村小学找不到的,不仅是家长,还有愿意教书的老师。

卢有英所在的小学共有6个年级,330名学生,却仅有9位老师。新学期还没正式到来,一位已经申请调走,另一位也正在打报告。

这次来北京的这群乡村老师,几乎所有人都面临着与卢有英相似的难题。坐在旅游大巴上,校长们最常谈论的话题是怎样分配人手。在这些学校里,师生比例普遍达到1:30,老师和校长统统身兼多职。他们教书,做饭,当宿舍保安,也当孩子们的“爸爸妈妈”。

北京的论坛上,主持人曾经走上台,动情地称赞他们:“是你们让我们看到,在贫困山区,是谁在支撑起这些校点,是谁在为孩子们守护未来。”但在私底下,许多校长坦承,“自己已经不堪重负”。

“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是现实,永远无法改变。”一位校长对记者说。 据《中国青年报》